

林慶彰 主編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 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十三編

林慶彰主編

第18冊

韓愈與宋學

——以北宋文道觀爲討論核心（上）

張瑞麟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韓愈與宋學——以北宋文道觀為討論核心（上）／張瑞麟 著

—初版—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民101〕

目 4+210 面；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三編；第 18 冊）

ISBN：978-986-254-802-8（精裝）

1.（唐）韓愈 2.學術思想 3.宋代文學 4.文學評論

030.8

101002170

ISBN-978-986-254-802-8



9 789862 548028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三編 第十八冊

ISBN：978-986-254-802-8

韓愈與宋學——以北宋文道觀為討論核心（上）

作 者 張瑞麟

主 編 林慶彰

總編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行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行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12 年 3 月

定 價 十三編 26 冊（精裝）新台幣 42,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韓愈與宋學

——以北宋文道觀爲討論核心（上）

張瑞麟 著

作者簡介

張瑞麟，一九七四年生，臺灣宜蘭人。私立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班畢業，取得文學博士。曾為台中縣立成功國中實習教師，今為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私立朝陽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研治二程、宋代文化思想、宋代文學理論。作品有碩士論文《二程思想在學術史上的意義——以「自得」概念為樞紐之探討》、博士論文《韓愈與宋學——以北宋文道觀為討論核心》，期刊論文數篇。

提 要

本文探究，以韓愈為焦點，文道觀為視角，剖析宋學的發展與演變。目的，除了說明韓愈對宋代學術的影響外，進一步將明晰其間蘊含的意義。為了釐清問題，掌握精神，研究方式，將採原典之回歸，而創新詮釋，則由科際的整合，關注於宋代經學、史學、文學等研究成果，並廣納相關研究資料，促使形成新的視野，因此資料多擷取自《全宋文》。基於關鍵資料的掌握，可知韓愈在宋代曾掀起兩次的崇尚風潮，第一次風潮讓韓愈修辭明道之文道一體的觀點進入到宋儒的視野，而第二次風潮則產生了意義的連結。有關此意義的內涵，即是韓愈在「不傳」、「不明」的敘述中所開啟之價值思維的探究，以及在「自立」、「立言」、「明道」、「能自樹立」的追求中所彰顯的主體精神。「初期宋學」的尊韓，即是未能加以契會，故終歸於沈寂。然而，此間存在之「元和風尚」的思維脈絡，實有奠基之作用。歐陽脩即在此基礎上，重契韓愈的學術精神，確立了宋學以價值與主體為核心的發展方向。此後，王安石、蘇軾、二程等即分別延續此學術精神而展現了各自成家的思維特色。至於印本文化，不僅促成宋代學術精神的展現，且使宋儒的視野從「師道」轉向「友道」之人與人間的對話，這也正是儒家「為己之學」的一種深化。

誌 謝

終於又告了一段落。如同碩士的學習階段一樣，我得到了許多人的幫助，才能順利地成長。家庭，一個堅實的後盾。歲月的流失，雖然讓父親與母親的身體變得虛弱，但是他們的關懷和付出實有增無減。美娟辛苦的照料著生活的瑣事，兄長與妹妹亦竭力協助，當然子恆的貼心懂事，都是讓我得以成長的動力。另一方面，即是協助我打開視野的指導教授。不論是碩士學習階段的高大威老師，或者是現在指引我方向的張高評老師與林朝成老師，他們寬闊的視野，深厚的學養，紮實的工夫，都是讓我可以不斷地在學業上有所突破的重要憑藉。當然，老師們的循循善誘，呵護與照顧，實是關鍵。

感謝李威熊老師、夏長樸老師、鍾彩鈞老師與王偉勇老師辛苦擔任口試委員，由於得到老師們的肯定，讓我擁有了自信，而從不同面向的細膩指點，讓我的論文能夠顯得緊密。

此外，同儕的互助，包括：景潭、童照、嘉璟、鑑毅、韻文、芳祥與瑋儀，因為有他們，使整個求學的過程，順利而精彩。而美端學姐長期的照顧，書蓉學妹在口試過程中之瑣事的處理，都值得致上深深謝意。

張高評老師說過，多堅持，在放下擔子時，會獲得意想不到的甜美果實。確實，沒有擔負，何來擁有？因此，在卸下擔子時，一方面是檢視自己所擁有的東西，而另一方面正是養足力氣，準備邁向另一段路程。由是，博士論文的寫作，實際上就只是一個段落，在喜悅擁有的成果時，不僅感謝眾人的幫助，更希望在未來的研究路上，能夠繼續得到真心的關懷。



目次

上 冊

第一章 緒 論	1
一、研究背景及目的	1
二、文獻回顧與評述	9
三、研究方法與進行步驟	13
第二章 師道與友道：韓愈到宋學的思維開展	21
一、以師道重契儒學	24
二、以友道輔成師道	35
三、學術對話：爲己之學的努力	56
四、小 結	58
第三章 從主體性論韓愈之文道觀	59
一、修辭與明道並存的思維	61
二、對韓愈「文」「道」關係之衡定	63
三、韓愈對「文」之界定	75
四、韓愈於「道」之視野	95
五、小 結	107
第四章 印本文化與韓集傳行	109
第一節 宋代的印本文化	110
一、「精」的文化特質	112
二、形之於真宗而成之於仁宗	122
三、小 結	144
第二節 北宋韓集的刊刻傳播與其影響	145
一、韓集在北宋的雕印與傳播	146

二、學術與雕印之間	153
三、韓集刊印的價值與意義	162
四、小 結	164
第五章 初期宋學與韓學詮釋	165
第一節 初期宋學之「尊韓」及其蘊含的問題	165
一、兩種思維的角度	167
二、韓愈地位的變化	173
三、駁雜的視野	187
四、小 結	191
第二節 元和風尚：初期宋學的思維脈絡	191
一、初期宋學的思維脈絡	193
二、「元和風尚」之內涵及其蘊含的意義	200
三、小 結	210

下 冊

第六章 從文道觀看歐陽脩對韓學之開展及其思維內涵	211
第一節 非韓以尊韓：歐陽脩對於韓愈文道觀之開展	211
一、歐陽脩對於韓愈文道觀之詮釋與批判	213
二、仁宗時期有關韓愈文道觀之詮釋	227
三、韓、李並稱所蘊含之意義	241
四、小 結	247
第二節 道純文粹：論歐陽脩的文學思維	248
一、詩文革新與太學體	249
二、歐陽脩的文學思維	262
三、小 結	280
第七章 從文道觀看王安石對韓學之詮釋及其思維內涵	283
第一節 直取韓心：王安石對韓愈文道觀的理解與轉化	284
一、王安石對於韓愈的態度	285
二、王安石對於韓愈學術之關注的面向	291
三、意義的展開方式：以心求心	299
四、小 結	301
第二節 精理成文：論王安石的文道觀	302
一、「文」成於「理」	303

二、王安石面對的時代課題	307
三、「道」在「精理」	311
四、與蘇軾及二程的對話	320
五、小 結	323
第八章 從文道觀看蘇軾對韓學之詮釋及其思維	
內涵	325
第一節 奇險蕩佚：蘇軾對韓愈文道觀的理解與轉化	326
一、蘇軾眼中的韓愈	327
二、關於韓愈之「文」的理解	330
三、關於韓愈之「道」的理解	334
四、小 結	337
第二節 文理自然：論蘇軾的文道觀	338
一、「斯文」與「一家之言」	339
二、「文理自然」的文道觀	343
三、與王安石及二程的對話	358
四、小 結	361
第九章 從文道觀看二程對韓學之詮釋及其思維	
內涵	363
第一節 親切近理：二程對於韓愈文道觀的理解與批判	364
一、二程眼中的韓愈	365
二、「近理」：二程對於韓愈之「道」的解讀	368
三、「親切」：二程對於韓愈之「文」的評價	373
四、小 結	374
第二節 攝文歸理：論二程的文道觀	375
一、關於二程的文學思維	376
二、「道」的意蘊	381
三、「文」的呈現	385
四、與王安石及蘇軾的對話	399
五、小 結	390
第十章 結 論	393
一、承韓的思維與宋學的發展	393
二、議題的延伸與關懷的面向	398
參考書目	401
附錄一：宋代帝王年表	417
附錄二：北宋論韓重要人物資料彙編	419

第一章 緒 論

一、研究背景及目的

宋代學術的內容是豐富而精彩的，尤其是在儒學的發展上，呈現了本質上的轉化，其中二程（程顥：伯淳，1032～1085；程頤：正叔，1033～1107）更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是故碩士論文即以二程為對象，以「自得」概念為樞紐，探究其為何能夠在與當時之各學術範疇間的互動裡，展現自身在學術史上特殊的價值與意義。在此研究裡，不僅是看到了個人學術的價值內涵，更彰顯出整體性的視角在理解宋儒學術生命時的重要性。〔註1〕

淵源的探討一直是學術研究的主要議題之一，對於理學，釐清為何會產生、形成或開啓這樣的價值內涵，依舊是目前被關注而有待詮解的焦點。不過，經過了二程的研究，令人可喜的發現是，在整體性價值精神的掌握下，原本讓人非議的概念，在獲得脈絡性的理解下，其實蘊含著不同的深刻意義，有關二程在文學方面的解讀即是。〔註2〕換言之，當個人的學術從整體性來考量，尤其是對宋儒而言，就能展現一家之氣象，對照於宋人在詩學上有「自成一家」的自覺走向〔註3〕，學術上的多元思維面貌應該是存在的

〔註1〕 張瑞麟：《二程思想在學術史上的意義：以「自得」概念為樞紐之探討》（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言研究所，2000年7月）。

〔註2〕 除碩士論文外，從二程論述，甚至是理學家論述的針對性而言，其間存有商榷的空間。見拙著〈宋代理學和文學的對立與對話（上）〉，《宋代文學研究叢刊》第12期（2006年6月），頁131～145；〈宋代理學和文學的對立與對話（下）〉，《宋代文學研究叢刊》第13期（2006年12月），頁137～151；〈宋代理學「攝文歸理」之思維與表現特質〉，《臺北大學人文學院人文集刊》第8期（2009年6月），頁29～62。

〔註3〕 張師高評於〈宋詩新變與自成一家〉指出其研究所得之著作，「書名標榜『傳

〔註4〕，如秦觀（少游，1049～1100）稱述「蘇氏之道」顯然就透露了這樣的訊息。由是，擴大視野到理學的範疇之外，重新詮釋理解「宋學」〔註5〕的豐富內涵，在意義上，實不亞於對理學形成的探究，甚至因而得以洞悉儒學發展的脈絡。

被視為理學先驅的韓愈（退之，768～824），除了作為追溯的角色之外，在轉向關注於宋學的內涵時，宋代學者所呈現之相關的評論內容，讓人感受到韓愈學術在宋代具有的聚焦性，而評論內容所顯示之推崇、批判與反思的不同現象，似乎與宋學的發展有著緊密的連繫性關係，是故本篇論文之研究題目將之訂定為「韓愈與宋學——以北宋文道觀為討論核心」。其中涉及的主要對象，包括了韓愈、宋學與文道觀三者，也就是說，可以將此三者視為是本篇論文所構成的主要元素，而研究的目的，在探討三者之最大公約數。從各單位元素來看，雖有四面八方無限開展的可能，卻也難以彰顯其特殊的價值，唯有在相互連繫中並畫出了方向，始能在延展中深化彼此的意義。一位儒者，一代學術，一個觀點，如何展現它們的意義呢？從言語道斷的思維而言，三者性質雖有所區別，但這不過是三種不同型態下的現象呈現，意義將取決於詮釋者是否能夠抉發其間所存在的連繫性關係。因此，文章所劃定的方向，其蘊含之意乃是：透過關注於北宋儒者在文道觀中所呈現之有關韓愈學術的接受與批判，探究韓愈與宋代學術發展間具有之價值與意義的思維

承開拓』『新變代雄』『會通化成』，此正宋詩相較於唐詩，自成一家之層面與策略。」見《自成一家與宋詩宗風：兼論唐宋詩之異同》（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11月），頁2。

〔註4〕劉子健即認為當以多元的角度進行關照，而採行一有機的分析模式。文見氏著《中國轉向內在——兩宋之際的文化內向》（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頁40。

〔註5〕「宋學」廣義來說是指宋代一朝的學術，不過如同夏君虞的界定：「所謂宋學者，乃指趙宋一代三百餘年儒家中心思想之義理學而言。研究宋學者，當先以宋代之義理學為對象……。」而所謂「義理學」即所謂的「理學」。由此可知，理學的卓越成就籠罩了有宋一代的學術，使得「理學」與「宋學」幾乎劃上了等號。如林繼平的《宋學探微》（臺北：蘭臺出版社，2002年3月），即以理學家為討論焦點，而杜保瑞的《北宋儒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4月），亦以北宋五子為論述對象。換言之，狹義的「宋學」，即界定為「理學」。然而，這樣的界定，隱含對於其他學術的衡定，是否恰當呢？本文以為是有待商榷的，因此試圖從多元並存的角度，嘗試論述宋學的多元內涵。夏氏論述見《宋學概要》（臺北：華世出版社，1976年12月），頁1～31。

脈絡。這是一個從韓愈到宋學的連續性、整體性的觀照，不僅意在釐清韓愈到宋學的脈絡性發展，而且是對韓愈、宋儒之整體性以及宋學之多元性內涵的掌握。

如此取徑是否合宜呢？從研究對象本身的價值與內涵作進一步的思考，韓愈、宋學、文道觀三者實具有意義上的緊密關聯。

以韓愈而言，很明顯的，本文初步能夠呈現的成果，即是在展示：隨著宋代學術的發展，有關韓愈的詮釋將有相應的演變，而其中即蘊含著價值的精神與意義的脈絡。眾所皆知，在唐代，韓愈乃是以「古文」〔註6〕的寫作以及「明道」〔註7〕、「闢佛」〔註8〕的主張，彰顯了自身在學術上的獨特價值，然而這樣的價值呈現，實不僅止於其生存之時空而已，最顯著的例子莫過於其古文的寫作具體影響著宋代的古文發展。〔註9〕此外，諸如韓詩之於

〔註6〕韓愈明確指陳自身為文之意蘊，足資探究其所謂「古文」之內涵者，主要有三篇文章：一為〈與馮宿論文書〉所云：「僕為文久，每自則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矣；小稱意即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即人亦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及示人，則人以爲好矣；小慚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慚者即必以爲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俟知者知耳。」（見馬其昶校注、馬茂元整理《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頁196）二為〈答劉正夫書〉所云：「或問：為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為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同前書，頁207）三為〈題哀辭後〉：「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其志在古文耳。雖然，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於古道者也。」（同前書，頁304～305）

〔註7〕除〈原道〉（《韓昌黎文集校注》，頁12～19）之作顯示出韓愈在儒學思想上的體認外，〈爭臣論〉中云：「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其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韓昌黎文集校注》，頁112～113）與〈進士策問·其四〉（《韓昌黎文集校注》，頁103）中以「夫子既沒，聖人之道不明」作為提問之前提，皆顯示了韓愈學術在「明道」上的盡心。

〔註8〕有關韓愈對於佛教的排斥與批判，論述之觀點主要呈現在〈原道〉、〈原性〉、〈進學解〉、〈論佛骨表〉、〈送王秀才序〉。

〔註9〕有關韓愈在「唐代文化史上之特殊地位」，陳寅恪已透過〈論韓愈〉（《陳寅恪論文集》，臺北：九思出版有限公司，1977年12月，頁1281～1292）一文，作了充分的展示，雖六點論述，學界仍各有看法，不盡認同，然其中對闢佛、明道、古文三者的關注則是一般。對於這三者，張清華於《韓學研究》（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8月，頁146、152、160）中認為「明道」乃是中唐古文運動的理論基礎，「文以明道」即是韓愈文體改革的指導思想，清楚地

宋詩〔註10〕與儒學思想之於新儒學〔註11〕，亦展現出與宋代學術發展具有連續而不可分割的關係。尤其是當學界開啓由「文化變遷」〔註12〕的角度來探究相關議題之後，中唐與宋代就被視為是一個連續性的整體發展，韓愈與宋代學術的關係自然就顯得更加緊密了，其間所蘊含之意義自當存有深究的價值。對於韓愈在宋代學術方面所扮演之角色與地位，學界亦多有指陳，如陳寅恪云：「唐代之史可分前後兩期，前期結束南北朝相承之舊局面，後期開啓趙宋以降之新局面，關於政治社會經濟者如此，關於文化學術者亦莫不如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學術史上承先啓後轉舊為新關捩點之人物也。」

指出了明道與古文之不可分割的關係，而傅樂成於〈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漢唐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7年9月初版，頁367）雖以為韓愈之闢佛沒有發生很大的影響，但提出其古文寫作的用意，亦是在於闢佛，則闢佛本與儒家思想相對而相關外，與古文寫作亦存在著緊密的關聯性，如是，三者實存在著環環相扣之意義上的關係。雖然韓愈古文寫作可以追溯其效法之對象，但從「意義的發展」來說，以傅樂成謂韓愈為宋代古文大盛之「開風氣的先驅」，唐宋古文發展實應視為一個新的階段與領域，錢穆於〈雜論唐代古文運動〉云：「韓柳二公，實乃承於詩賦五七言詩盛興以後，純文學之發展，已達燦爛成熟之境，而二公乃站於純文學之立場，求取融化後起詩賦純文學之情趣風神以納入於短篇散文之中，而使短篇散文亦得侵入純文學之閭域，而確占一席之地。故二公之貢獻，實可謂在中國文學園地中，增殖新苗，其後乃蔚成林藪，此即後來之所謂唐宋古文是也。故苟為古文，則必奉韓柳為開山之祖師。」（《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四）》，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4月，頁53）正清楚揭示出由唐而宋韓愈在古文發展上所具有的地位。

〔註10〕韓詩與宋詩間的關係，可參見曾金城：《韓愈詩歌唐宋接受研究》（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96學年度博士論文）與龔鵬程：〈從杜甫、韓愈到宋詩的形成〉（《唐代思潮》，宜蘭：佛光人文社會學院，2001年6月，頁653~679）的說法。

〔註11〕從思想史的角度來說，韓愈的儒家思想乃是宋代儒學發展的先驅，幾乎已成定論。至於「新儒學」的提法，乃是依據牟宗三的觀點，見《宋明儒學的問題與發展》（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5月），頁6。杜維明亦以為宋明儒學的稱謂比宋明理學的稱謂來得適宜。見杜維明：《現代精神與儒家傳統》（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7年5月），頁417。

〔註12〕關於唐宋社會文化變遷的討論，形成所謂「唐宋轉型」的思維脈絡，最受關注者，莫過於內藤湖南的提法，王水照更撰文賦予更大的意義。論述分別見內藤湖南：〈近世史的意義〉，《中國史通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1月），頁323~334；〈概括的唐宋時代觀〉劉俊文編、黃約瑟譯《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7月），頁10~18。王水照：〈重提「內藤命題」〉，《文學遺產》2006年第2期。龔鵬程則以為鎖定於「文化變遷」的角度，對於「唐宋變革」的討論將更具意義，見氏著《唐宋文化之變遷》，《唐代思潮》，頁442~470。

〔註13〕視韓愈乃是開啓宋代文化學術新局面的關鍵角色，肯認之意不可謂不大。錢鍾書亦云：「韓昌黎之在北宋，可謂千秋萬歲，名不寂寞者矣。歐陽永叔尊之爲文宗，石徂徠列之於道統。」〔註14〕文與道乃宋代學術發展的核心，藉宋儒將韓愈標舉爲文宗與道統之所在，則推尊之意可謂無以復加。錢穆則有云：「然則治宋學當何自始？曰：必始於唐，而昌黎韓氏爲之率。……治宋學者首昌黎，則可不昧乎其所入矣。」〔註15〕不僅揭示了唐宋之間連續性關係，也可肯定了韓愈的學術精神對於宋學的意義。因此，不論是對於韓愈學術本身的理解而言，或者是對於宋代學術精神的適切掌握而言，由韓愈這個「點」作爲思維之基礎而尋覓其與宋學兩者之間所畫出的精神脈絡，是具有極爲重要的價值。以往對個人學術的關注，多將重心鎖定於其自身學術的內涵及其相較於當時學術所具有的特殊價值，這近似於「點」的盡情描繪，雖不失其精彩，但想要以此而充分體現出韓愈的學術價值與特色，顯然是有所不足的，畢竟韓愈的學術生命仍須透過其思維脈絡爲儒者所承繼而持續在宋代延展著。換言之，當宋儒推展了韓愈之學術的價值精神，並將其融入於宋學之中，那麼將視野延伸至宋代，將連繫於兩者之間的思維脈絡加以釐清，這應是彰顯韓愈之核心價值的妥善方式之一，是以本文嘗試以此爲之。

本文關注的焦點，若以鳥之雙翼爲喻，韓愈是一翼，宋學即是另一翼。若再進一步分辨，就整個研究的終極關懷來說，韓愈算是個討論的著力點，或者說是開啓意義的始點，而最終乃是要歸諸於宋學的釐清與闡釋。

宋學，何以需要再加以釐清或闡釋呢？首先，即是對於宋學內涵的理解問題。雖說讀者在每一次的接受過程中，都賦予了新的詮釋，在新的詮釋中產生意義，但是在實際上，長久以來不斷詮釋所形成的接受慣性，讓內涵趨於一致性，將宋代學術局限在理學的討論〔註16〕，理學成爲宋代學術的表徵，

〔註13〕陳寅恪：〈論韓愈〉，《陳寅恪論文集》，頁1292。

〔註14〕錢鍾書：《談藝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1月），頁187。

〔註15〕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年7月），頁2。

〔註16〕以往討論宋代學術，莫不鎖定在理學家身上，將理學與宋學等同視之。如林繼平在《宋學探微》（臺北：蘭臺出版社，2002年3月）中，就以理學家的學術當作宋學的完整內涵來陳述。鄧廣銘即以爲理學只是宋學的一個支派，其間存有區別，不應該把兩者等同起來。見氏著《略談宋學》，《鄧廣銘治史叢

理學的形成與發展就代表著宋代學術的形成與發展，漠視了其他異質之學術的存在與價值，這如同將唐詩、宋詞視為其一代學術之表徵一樣，漠視了宋代在詩領域所呈現之嶄新面貌與美學價值，這是一元的強勢論斷，基於典範的判準，將不能契合於自身理論框架的學術內涵，驅逐於詮釋的視野之外，排他性讓多元詮釋喪失了存在的空間，然而如同歐陽脩（永叔，1007～1073）所云：「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註17〕具有價值的學術內涵終難以被掩飾或漠視，以宋詩而言，在轉換了以唐詩為典範的視野之後，意義就不斷地在重新詮釋的過程中彰顯開來，宋學將會是如何呢？或許有人會以為本文是要將理學作為宋學建立的對立面，藉由貶低理學的內涵來展現宋學的價值，實則不然，因為這樣的思維仍是在一元的思維框架中糾纏，宋詩之於唐詩，就是從多元並存的角度才得以建構其價值，是以釐清宋學的內涵，不必然要與理學產生對立的關係，相反地其中更存在著因宋學的釐清而進一步彰顯理學之價值的可能性。〔註18〕換言之，理學可因宋學而見其精微，宋學可因理學而成其廣大。

其次，就宋學的詮釋價值而言。依據王國維所云：「故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動與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漢唐，後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註19〕陳寅恪亦云：「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

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10月二刷，1997年6月第1版），頁163～176。漆俠沿著鄧廣銘的說法，將理學納入到宋學的體系中而與各家各派並列以觀，詳見氏著《宋學的發展和演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

〔註17〕蘇軾：〈與謝民師推官書〉，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7月），頁1419。

〔註18〕一元的具有規律性的承繼關係，或許較為讓人容易理解與接受，然而價值思維脈絡的存在，並非預設著實踐體系只有單線發展的可能，也不必然存在著所謂形成、發展而衰落規律法則，畢竟站在詮釋者的角度來說，所處的位子時時充滿著特別的挑戰，其中蘊含著無限開展或突破舊有格局的可能，何有因循之規律？何有集大成之終結？因此，多元性思索不僅較能貼近詮釋之對象，更能展現其獨特的意義，尤其是對於特別強調自得與自成一家的宋學而言。近年，即使在理學領域內，也有企圖用多元的角度來詮釋，如杜保瑞所云：「宋明諸儒皆是一大學說體系中的一部份，並沒有誰更證成了儒學的問題，只有誰從什麼角度論述理論的問題。」（《北宋儒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4月，頁2）因此，從多元性思索，或說保存其多元性，應該是在對宋學的解析與理解上一個具有意義的思維角度。

〔註19〕王國維：〈宋代之金石學〉，收於《海寧王靜安遺書（四）》之《靜安文集續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5月），頁1885。

必復振。」〔註20〕錢穆亦云：「治近代學術者當何自始？曰：必始於宋。」〔註21〕由推崇之意，可以想見在其視野中宋代學術所具有的價值與意義。然而，學術的價值，不僅是有賴於擁有深廣的學術內涵，更取決於價值精神是否依然不減，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註22〕，就是說學術的價值精神必須透過人之自覺的實踐而加以體現，這是「生命的學問」〔註23〕所獨具的特質，在此生氣蓬勃生意盎然底下，學術因而具有存在的價值。相反地，若學術失去了與人內在精神的契合，失去了讓人得以實踐、體貼的元素，即使崇高，縱然奧妙，當束諸高閣時，仍僅是「無靈魂的軀殼」〔註24〕，沒有任何存在的真實價值與意義。如是，陳氏與錢氏將宋學視為學術文化往前發展之核心或源頭，其中所蘊含之意實是揭示此價值精神依然在活躍著。

再以今日所謂新儒學的開展來說，實質上即是站在宋代理學的基礎上，藉由價值精神之廓清與系統之梳理，從而企圖繼續往前拓展與建構符合於當今時代課題下的價值內涵。是故，當宋學仍是具有學問的生命，一方面自然就展現出其重要性與價值性，另一方面更賦予了承受的學者以無限的權力，即在體貼入微的過程中，若有一絲之不安，即當以「創造性的詮釋」〔註25〕探尋、建構一個能「安」、可「安」的意義脈絡或是價值體系。綜觀今日對於宋學的研究成果，或主理學家、或主文學家、或兼容並蓄，呈現出不同的詮釋面貌，這或許正吻合於宋代學術的特點，所謂「學統四起」〔註26〕，意義

〔註20〕陳寅恪：〈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7月），頁277。陳氏以為往後學術的發展「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學術之復興，或新宋學之建立是已。」雖言「新」，然其精神實為一脈之相承。

〔註21〕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1。

〔註22〕《十三經注疏·論語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9月），頁140。

〔註23〕牟宗三視中國的思想為一生命的學問，詳見〈關於生命的學問〉，《生命的學問》（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3月），頁33~39。

〔註24〕原為傅樂成指東漢末年以後儒學缺乏激盪的狀態，語見〈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漢唐史論集》，頁339。

〔註25〕「創造的詮釋學」為傅偉動的提法，內容包含五個層次，包含：實謂、意謂、蘊謂、當謂、必謂，其意向乃是專為中國思想傳統而設方法論嘗試。見氏著〈創造的詮釋學及其應用〉，《從創造的詮釋學到大乘佛學——「哲學與宗教」四集》（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5月），頁1~46。

〔註26〕清·全祖望在〈宋元儒學案序錄〉中指出：「慶曆之際，學統四起。」清楚地指出當時學術發展的盛況。見沈善洪主編、吳光執行主編：《黃宗羲全集》第3冊，《宋元學案》（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頁28。

近似於在社會變遷之下再次開啓之「哲學的突破」〔註 27〕，宋儒如同回轉至先秦而為「子學之儒」〔註 28〕，是以在內涵上展現多元的思維面貌，然而在詮釋之中存在著相互衝突的些許癥結，這些難以化解的矛盾，讓宋學的整體性產生了損傷，所謂「宋學精神」〔註 29〕竟成一家之言、莫衷一是的個別闡釋而已。因此，創造性的詮釋仍不斷地在進行著，以期探究出一個更為適切的闡釋模式，讓宋學不僅展現出多元的思維內涵，更具有整體性的精神脈絡，本文亦嘗試為之。

以文道觀而言，在中國文學的批評視野中，一直是被置於關注的焦點之一，郭紹虞即明白指出這「實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最重要的問題」〔註 30〕，

〔註 27〕「哲學的突破」是指突破對既有規範的思維模式，透過理性的反思，開啓一個有關於人生命價值的新思維。關於此說法，最初為存在主義哲學家雅斯培所提，其中重要觀點尚有「樞紐時代」("axialage")以稱述四大文明由原始階段突入高級文化的階段，而余英時認為進一步以較清楚且寬廣的視野來看待全世界的文明當為派森思 (Talcott Parsons)，是以引伸其說而進行詳細的闡釋，闡釋中思索及社會變遷使「士」的階層形成而與「哲學的突破」構成緊密的相關性，論述縝密值得參究。見余氏著《中國知識階層史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 年 8 月)，頁 30~38。杜維明則對「軸心時代」的涵義進行了闡述，而以多元文化與反思為肯認之思維取向。見氏著《軸心時代的涵義》，《現代精神與儒家傳統》，頁 1~41。

〔註 28〕錢穆特別指出除原周孔並稱轉變為孔孟並稱外，宋儒多泛濫於「先秦之子部」，因言「漢儒乃經學之儒，而宋儒則轉回到子學之儒」並斷言：「宋儒之經學，實亦是一種子學之變相。」透過子學具有多元走向的特性藉以描繪宋儒的學術多元面貌，不失為一足以令人耳目一新的比喻，然而經、子抑揚相對，是否適當仍有商榷空間。見氏著《朱子學提綱》(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1 年 6 月)，頁 11~12。

〔註 29〕錢穆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 7)中指出宋學的精神有兩個，包括：「革新政令」與「創通經義」，但在《初期宋學》(《中國學術史論叢(五)》(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1 年 8 月)，頁 3~4)則指出新文學/古文運動、新教育與變法運動三者，而「完養心性」實為更重要的「中心精神」。牟宗三則指出宋明儒的主要目的「是在豁醒先秦儒家之『成德之教』，是要說明吾人之自覺的道德實踐所以可能之超越的根據。」(《心體與性體》，臺北：正中書局，1996 年 2 月，頁 37)張師高評則以會通化成作為宋型文化的核心，見《會通化成與宋代詩學》(台南：國立成功大學出版組，2000 年 8 月)，頁 1。龔鵬程則以「知性的反省」作為思維的核心，見龔鵬程：《知性的反省——宋詩的基本風貌》，見《文學與美學》(臺北：業強出版社，1995 年 1 月修訂版)，頁 152~203。劉方即企圖釐清這個內涵，詳見《宋型文化的內涵特徵——精神內核》，《宋型文化與宋代美學精神》(成都：巴蜀書社，2004 年 8 月)，頁 34~50。

〔註 30〕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文與道的問題》，《郭紹虞說文論》(上海：上海